

• 袁良駿 著 • 吉林大學出版社

白先勇小說藝術論

白先勇是當代台港及海外華人小說家中的才，他的《台北人》、《紐約客》係列小說動文壇，他以多姿多采的人物形象，獨特而又多樣的語言藝術風格，輝耀了中華現代文學。

白先勇小说艺术论

袁良骏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小说艺术论

袁良骏著

责任编辑：阮碧纯

封面设计：张沫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1年8月第1版

印张：9.625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214千字

印数：1—1 000册

ISBN 7-5601-0927-6/I·43

定价：4.25元

序

良骏同志写完了《白先勇小说艺术论》这本书，约我写一篇小序，虽应诺下来，但踌躇良久。因我读白先勇的小说并不多，因此对这本研究著作未必能说出一点像样的议论来，我不过是在这里凑个热闹，借此随便说几句罢了。

我印象里面，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写女性形象最是传神，小说中她们的命运大抵都在悲苦中终结，给读者带来的常常是一片悲怆与惆怅。我想，白先勇之能写得如此动人入微，在她们哀怨的灵魂深处敲出令人震撼的音响，其原因不独是他熟悉她们，更因他的如椽之笔进入到她们的心灵世界的深处，从中探幽烛微，以求灵犀相通，因之泼墨所至，生发着作者满纸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同情。更有甚者，女性常常代表着弱者，她们的不幸是不幸者中之大不幸者，小说的宗旨为弱者请命作主题，勾勒和告示着这里孕育着一个时代苦难的主题。作家的表现时代，总是猎取现实中聚光点凝结深重的创作对象为主线的，白先勇所取的人物所以常常是女性，只因女性是社会生活中多重性的被损害者，他的艺术观照力的集注于此，就不难理解了。

20世纪的中国，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封建体制的渐次解体，在国民性的消极面上，造成了孱弱、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其间虽经多次种种社会变革，但此种压抑心态

为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种心理的积淀，虽有所改变而未能真正解脱。精神世界的改变是最为缓慢的，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状态造成了种种陈旧意识，犹冰冻三尺之未能顷刻消融一样，可以说这个解脱过程至今仍未完结。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统治权力虽几易其手，保持的封建云雾依然凝结不散，近几十年，台湾的社会生活渗入了西方现代意识，洋气与土气的混合，蜕变为一种畸形的社会心理形态，不论社会各个阶层中趋向不尽相同，但追求财富的拜金主义则成为社会心态的主流。在人欲横流的倾泻之下，一切残暴、凶狠、不知耻的现实浊流充斥于社会。知识分子、老人、尤其是妇女的命运，就在这种历史的风捲之中可悲地消蚀着生命。不少台湾文学所表现的主题常常是这类悲剧的主题，这并不是偶然的。

多年来有人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问题，议论不一，认为基本主题为悲剧是一种看法。白先勇对这一基本主题的艺术运思，是植根于生活的坚实基础上的。在近几十年中，台湾的现实一方面是经济生活的活跃和上升，似乎已造就着西方社会的外观；另一方面，血盆似的强者之口，每天在吞噬着人血，无数的人尤其是女性的被摧残、被扼杀的情状最为突出。现实生活中有千差万别的真实事件，见之不尽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但作家总是猎取生活中最富有激情的真实状态，最能使人屏息凝视的人物形象。白先勇小说的引起注意，其缘由大抵出于此。

历来有成就的作家，不少是以作品的悲剧色彩获致重大成就的，读者也由此获致审美感受，获致省悟，获致良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产生悲剧的根源是社会矛盾，要解脱此种矛盾将是极端复杂、尖锐和不可调和的，由此产生了

悲剧的冲突。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主客观的不可调和性是产生悲剧的根源，而这种不可调和性是社会存在中普遍的现象。人们追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向往并非不合理，这些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千差万别的种种追求蕴藏着多少理性的光辉，然而它总是常常在“历史的必然要求”下撞得粉碎。人类社会带来这种永恒现象和永恒的规律不会终结，因而人类社会的悲剧也将是永恒的。

作家在悲剧意识中寻求艺术归宿，不仅仅是为着强烈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在精神现象上还各有不同的原因。首先是作家出于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思维，将人间的不平诉之于文学艺术；其次，作家所要寻求的同实际生活的存在之间产生了难以解脱的冲突，悲剧就不可能不出现；再次，悲剧产生了人们精神上的极度不平衡，由此促使人们产生思索，产生人的追求本能。倘将悲剧视作是喻示对人世的悲观绝望，那是十分浅薄的短见。悲剧所产生的力量具有博大的进取精神，是人生巨大的启动力。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为人们“激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①。这“净化”，历来诸家的解释不一，这里自不必讨论，但“净化”不只是同情、感伤、愤恚而已，净化乃是经过情感的宣泄之后，唤起人们的生命能量，对生活，对现实世界，晓知如何去择取，如何去摈弃，如何爱，如何恨，达到一种新的理念的净化境界。

当然我并不是说，白先勇的小说已经充分到达这一境界了，而是从他创作生活发展的进程看，正在渐次地向这一趋向迈步。也就是说，他在探求和塑造这一社会主题中的悲剧所展示的艺术美，在闪着自己的光。这一点，在良骏同志这本著作中有着系统性的研究，对白先勇的小说，从思想到艺

术，从继承传统到吸收外来影响，从民族色彩到文体，洋洋洒洒，自成体系。我在前面说过，我对白先勇的小说知之甚少，几乎不能置一辞，以上所云，都是隔靴搔痒之谈，但既然已说了这些，就算作是对这本书出版的一点祝贺之意罢。是为序。

洁 淇

1990年9月24日

① 见《诗学》第六章。

目 录

序	(洁 混)	(1)
第一章 导论：一个旧时代的挽歌——论白先勇小 说的悲剧倾向.....	(1)	
第二章 从《金大奶奶》到《骨灰》——论白先勇 的创作道路.....	(26)	
第三章 “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论白先勇小 说的传统特色.....	(43)	
第四章 《红楼》海外放奇葩——论白先勇与《红 楼梦》	(66)	
第五章 “融传统于现代”——论白先勇小说的现 代特色.....	(94)	
第六章 “挖不完的宝藏”——论白先勇笔下的女 性形象系列.....	(118)	
第七章 时代前驱的泪与魂——论白先勇笔下的知 识分子形象.....	(143)	
第八章 “献身精神的结晶”——论白先勇小说的 艺术魅力.....	(163)	
第九章 六十年代崛起的“文体家”——论白先勇 小说的语言风格美.....	(187)	
第十章 一次艰难的跋涉——论《孽子》	(216)	

- 第十一章 中国现代文坛的两位精雕细刻派——论**
白先勇与鲁迅 (251)
- 第十二章 广收博采，中体西用——论白先勇的文**
艺思想 (274)

第一章 导论：

一个旧时代的挽歌

——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倾向

从1958年登上文坛到现在，白先勇已经有了30年的创作生涯。30年来，他共发表短篇小说36篇，长篇小说一部。数量并不算多。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一二十篇小说陆续发表后，便立即得到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坛的热切关注与高度评价。被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家。”梁实秋、夏志清、姚一苇等文坛前辈以及欧阳子、刘绍铭、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等白先勇的同辈作家都写过关于他的创作过程、创作思想以及艺术成就的专论或专著。白先勇早已成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坛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多年阻隔，白先勇的小说回归祖国大陆还只是近10年间事。10年来，《当代》、《收获》等杂志陆续重发过一些他的代表作。广西、福建等出版社编选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北方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长篇《孽子》。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勇的这些蜚声台港及海外的小说作

品，同样获得了大陆的广大读者。他的小说集坊间早已告罄。似乎读书无用、知识贬值的恶浪浊流对他的小说的出版发行并无影响。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大陆及台港海外有不同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白先勇的小说作品为什么照样会被祖国大陆读者所接受呢？至少，恐怕有如下的几个原因：第一、海峡两岸虽然多年阻隔，但毕竟是中国领土，两岸人民也都是炎黄子孙，他们虽然被历史的原因而分开，但他们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共同的风俗文化，这是两岸文学所以极易沟通的最根本原因。而对白先勇来说，由于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国传统，这种沟通自然更为方便。第二、白先勇不是一位赞歌手，而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他刻画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不幸者，这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足以引起大陆读者极大的关心和同情。第三、白先勇的一部分作品写的是他父辈的“英雄末路”，属于“没落贵族的挽歌”，这些作品虽有一定的思想局限，但却有极大的认识意义；从文学史上说，它们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不可或缺，自然也引起了大陆读者的兴趣与关注。第四、白先勇的小说作品具有卓越的艺术技巧，他属于鲁迅、吴组缃一类的精雕细刻派作家，不追求创作数量，但却十分讲究艺术水准，大多数作品具有极深的思想意蕴和极强的艺术功力，耐人寻味，经得起推敲，这就更容易在大陆读者中不胫而走。

伴随着海峡两岸各种交往的不断开展，对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评介、研究工作也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对白先勇小说作品的评论文章也星星点点地见诸各地报刊。一些专门研究台湾文学的著作中，白先勇小说研究也大都列有专节或专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毋庸讳言，大

陆评论界，学术界对白先勇小说的研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还只能说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白先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而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却又显得十分惹眼。显而易见，像整个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需要有一个长足进展一样，白先勇研究也需要扎实实地深入开展起来。

二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白先勇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小说痛苦多、欢乐少”^①；它们是“对过去、对自己最辉煌的时代的一种哀悼”^②；它们是写在“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之际^③。在小说集《台北人》^④的扉页上，他写上了这样的题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并且引录了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在“纽约客”系列的卷首，则引录了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些表述和引诗，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白先勇小说的悲剧色彩，它们毋宁说是我们分析白先勇作品的一把钥匙。

在白先勇旧时代的挽歌中，有一组作品写的是40年代末大陆的风云变幻及其引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他们的依附者——太太、姨太太、交际花以及中、下级军官等的没落和悲剧。所谓“没落贵族的挽歌”，写的便是达官贵人，而他们的依附者的悲剧，也无非是这支挽歌的变奏曲。《国葬》、《梁父吟》、《思旧赋》、《游园惊梦》、《秋思》、《永

远的尹雪艳》、《岁除》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篇目。

《国葬》和《梁父吟》写的都是国民党开国元勋或高级将领的葬礼，虽然他们生前威风八面、声势烜赫，死后葬礼也极其隆重，但毕竟逝者已矣，全篇自然笼罩在一片悲剧气氛之中。《思旧赋》中的名将虽然健在，但夫人亡故，女儿闹翻，儿子又得了精神病，其悲剧气氛比起以上两篇来，一点也不逊色。《秋思》和《游园惊梦》二篇题旨相近，写的是达官贵人的遗孀的冷落和悲哀。《秋思》的主人公华太太，《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在丈夫生前都曾享受过荣华富贵，但丈夫谢世后，她们的地位不能不一落千丈，她们尝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况味，她们似乎成了被台湾上流社会遗弃的人。《永远的尹雪艳》写的是一个光艳照人、永不“凋谢”的交际花，她从上海而台北，似乎生活照常、青春永驻，但小说用皮里阳秋之笔，事实上写出了她的内心的空虚和凄凉。《岁除》中的赖鸣升是一名由大陆赴台的下级军官，他打了一辈子的仗，为蒋介石国民党出生入死，在台儿庄战役中几乎壮烈牺牲。但他充其量只混了一个骑兵连长，而且连半个勋章都没捞到。他的从军史，是一部伤心史。到台退役后，一点可怜的退休金又被一个山地婆娘全部拐走，弄得他穷困潦倒，孤苦伶仃。赖鸣升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又不尽是他个人的悲剧，它密切交织着那个政治悲剧、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白先勇的上述作品，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段重要空白。1949年由大陆赴台的“台北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产物，他们虽然是生活中的失意者，但却是文学上的“幸运儿”。他们有资格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席之地。没有他们，现代文学便缺了重要的一角。这些“没落贵

族的挽歌”，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巴尔扎克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曹雪芹虽有一定的叛逆思想，但毕竟是一个贵族子弟，他们的阶级同情都在行将灭亡的贵族一边。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文学描写中却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给了那些贵族男女无情的讽刺和嘲笑，并且写出了他们灭亡的必然性。白先勇和他们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他的“没落贵族的挽歌”也同样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感和沧桑感。他是一个历史悲剧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勇敢地面对了历史，他把自己对父辈的同情作了适度的控制，他的皮里阳秋的讽喻也是耐人寻味的。《人间喜剧》和《红楼梦》都刻画了为数众多的没落贵族男女，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典型，它们具有不朽的美学价值。在这方面，白先勇虽然尚无法和他们相比，但是，他毕竟已经为人们塑造了一系列十分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已经无法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排除了。

上述“没落贵族的挽歌”，受到了两方面的批评：有人说它是“亡国之音”，而有人则称作者为“殡仪馆的化妆师”^⑤，有人更认为：“白先勇笔下人物所流露出来对‘过去’的眷恋，与其说是留恋逝去的美或五千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毋宁说是眷恋过去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会来得恰当些。”^⑥这些批评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它们之所以不能成立，乃因为它们过分夸大了作家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态度或倾向对文学作品的投影，而完全忽略了文学独立的美学价值。事实上，白先勇虽然崇敬他的父辈，但是，他们之间毕竟有着深深的代沟，在很多方面，白先勇并不与自己的父辈认同。假如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仅仅为了表示对失去的政

治权益的眷恋，那么，他大可以更积极一些，去跟着那些军旅作家创作“反攻复国”文学。但是，众所周知，白先勇认为这样的文学是“没有力量的，不真实的”^⑦，因而也是缺乏文学价值的。他自己则一篇也不写。相形之下更可以看出，白先勇的“没落贵族的挽歌”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人生探索，是保持了文学的庄严与品位的。作为一名“末路英雄”的子弟；白先勇奏出一曲曲“没落贵族的挽歌”，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何况，“没落贵族的挽歌”只是白先勇创作的一小部分，他的时代哀歌还有更深邃复杂、更丰富多彩的乐章呢？白先勇自己说得好：“有些人批评我写没落的贵族，我觉得不是，我什么都写吆。在《台北人》里，老兵有，妓女有，酒女有，老佣人、老副官、上的下的，各式各样的人”^⑧。白先勇的确并非仅仅写没落贵族，在《台北人》以及白先勇的其他小说作品中，我们确实接触了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确实领略了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社会。仅仅从悲剧艺术的角度，我们就看到了远比“没落贵族的挽歌”丰富复杂得多的各式各样的悲剧。

三

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不仅导致了国民党贵族的没落，也给平白无辜的普通人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酿成的人间悲剧，在白先勇的小说作品中也占有突出的位置。这类作品，我们可以《花桥荣记》、《一把青》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为代表。这些战争带来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可称为“无辜者的哀歌”。

《花桥荣记》的主人公卢先生是一位随着国民党军队撤

退到台北的小学教师，原籍桂林，由于战争，撤离大陆时与自己的未婚妻罗姑娘失散。卢是一位笃于爱情的正直善良的小知识分子，到台后一直不娶，省吃俭用攒钱准备接未婚妻到台结婚。辛辛苦苦攒了15年，攒了10根金条的款项，寄给在香港的自称可以接罗姑娘出来与他完婚的表哥，想不到这位表哥竟是一个骗子手，收到钱后便转眼不认帐了。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卢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与一个浪荡的洗衣妇苟合成婚，吃尽苦头，终至神经失常，郁郁而死。《一把青》的主人公朱青则是一位战死的国民党空军下级军官的新婚妻子。丈夫死后，她曾寻死觅活、痛不欲生。但随军到台后，她也完全改变了模样：她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军中歌女，身边不断有三三两两年轻的空军军官相伴，以前那种对爱情的执着、忠贞，一点也没有了。当他的新情人小顾训练失事死亡后，她几乎不再有眼泪和哀伤。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主人公王雄，原籍湖南乡下，不幸被抓壮丁入伍，后又被裹胁至台。复员后，当了一名大户人家的男仆。被抓壮丁前，母亲已经给他养了童养媳，他和童养媳犹如兄妹，两小无猜。到台后，他一直惦记着何时回大陆与自己的童养媳完婚。但是，岁月的流逝使他的这种美好愿望变成了泡影，他便下意识地将自己的爱心交给了主人家的不到10岁的娇小姐，对她关怀、伏侍备至，甚至不惜变牛作马讨取她的欢心。想不到这位小姐上学后，年龄渐大，他的这份真情对她反成累赘。当她先是拒绝他的接送、后又打碎他特为她买来的金鱼鱼缸后，他的精神遭受了极大摧残。加上女仆喜妹不断地对他奚落挖苦，终于有一天，在他狠狠教训了喜妹后，投海自杀了。

白先勇对这几位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的悲悯同情，绝不亚

于对那些达官贵人和他们的依附者。因而小说的悲剧力量、人物的悲剧意义也丝毫不亚于那些“没落贵族的挽歌”。白先勇十分推崇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旧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天悯人的基督精神”，认为“这是文学情怀的最高境界”^⑨。他自己对卢先生、朱青、王雄等人物的塑造，对他们悲剧的描绘，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

四

除了描写交际花（实为高等妓女）的《永远的尹雪艳》，白先勇还写了几篇以妓女、舞女和酒吧女为题材的作品，这便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操着最下贱、最令人瞧不起的皮肉或卖笑生涯。对于这些人物，白先勇同样是充满人道主义同情的。在这些作品中，白先勇写出了主人公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这些作品可称之为“沦落者的哀歌”。

《孤恋花》是这类作品中最为催人泪下的一篇。小说塑造了五宝和娟娟两个不幸的酒女形象，而实际她们是一而二、二而一：五宝是娟娟的前身，娟娟则是五宝的再现。娟娟命苦异常：母亲是疯子，自己15岁便被生父强奸，沦为酒女后性格荏弱，受尽酒客、嫖客的摧残蹂躏。最后，凶狠残暴、毫无人性的黑社会头目柯老雄霸占了她。对她不仅随时随地滥施淫欲，而且一再残酷殴打，弄得她“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一天深夜，当柯老雄再次大发酒疯，对他进行蹂躏、斥骂和撕打时，娟娟再也忍无可忍了，她用一只“黑铁熨斗”，向被自己骑在身上的赤精大条的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